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

黄保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兼任本刊及《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100875 北京)

对于基督教来说,马丁·路德是《圣经》写成之后与奥古斯丁齐名的大神学家,但是,他却是一位被人们谈论极多却了解极少的神学家。

马丁·路德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是新教的英雄,关于他的材料很多,但如何评价其可信度则非常困难。直到 1883 年开始编辑出版《威玛版路德全集》(Weimarer Ausgaben)时,对路德的真正学术研究才得以起步。可每个研究者都受到其时代及主观前见和背景的限制,对路德宗的正统主义者来说,路德是该宗派之教义的塑造者;对于虔敬主义来说,路德是一个十分注重个人信仰的强调者;而对于十九世纪的人们来说,路德则是一个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新教徒好像被迫来为路德思想的真理性和良善性辩护一样,而罗马天主教徒则被迫去反对这一切。这种研究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神学到影响性的思想(1870—1910)、霍尔(KARL HOLL)和路德研究的复兴(LUTHER-RENESSANCE)(1910—1945)、巴特(1920—1960)和艾伯林(GEHARD EBELING)的路德诠释到当代路德研究(包括罗马天主教的路德研究 1940—2000)的发展,而斯堪的那维亚特别是隆德学派在 20 世纪对路德的研究仍然受到上述的德语路线的深刻影响。自 1978 年以来兴起的芬兰学派,则对 1888 年以来的新康德主义德语学术传统所占据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且在欧洲和北美受到了越来越多地接受和影响;目前,这个问题的研究促进了新教、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三大宗派之间的对话,产生了一系列的和平性文件。

国内的研究现状是,马丁·路德与德国宗教改革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进入中国语境,对之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于民国大陆时期,但真正的研究开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并经历了研究立场的、从政治文化批判到学术性批判的转变;发起了对研究者自身传统的信仰性挑战和对宗教改革神学的学术性挑战;提出了诸如“精神生活如何与世俗生活保持有益的张力、如何对社会政治发挥有效的作用”等中国式思考;凸显出中国学者的宗教、神学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和科际交叉性,但是,关于路德原典的研究和翻译仍然非常缺乏,对于路德神学思想的理解也主要限于泛论。

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实践到理论层面,遇到了“因信称义”与强调善行的中国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虽然许多学者从处境化、中国化、对话和“淡化引信称义”等多种视角进行了努力,但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中国特色与基督宗教本身的本质性之间的可能性分离,引起了国际基督教学术界的挑战。其中的核心是关于“因信称义”的再诠释问题,而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研究和翻译来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国内外都仍未得到真正的开展。

而汉语基督教界,改革宗的加尔文强调行为乃是信心体现的“律法主义倾向”对于华人基督徒来,其影响和吸引力远远超过路德的“因信称义”。

自从学界开始对路德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以来,德国传统的将“因信称义”诠释为“法庭式”(forensic)的宣称性特点占据了统治和霸权的地位,因此,基督徒的“称义”(justification)与“成圣”

(sanctification) 被理解为先后次序的而不是同时的发生, 称义”只有宣称的 (proclaimingly)、应许的 (promisively) 和未来的 (futural) 意义, 而不是效果性的 (effective)、现在时的 (present) 和真实的 (real); “成圣”则是无法达到的 (unachievable)、需要终身努力的 (needing to seek for the whole life)。这种诠释, 不仅使得“因信称义”有着被误解为“只讲相信而不将行为”而导致处基督徒不需要行善的异端和错误来, 而且使虔诚追求成圣而却无法达到的信徒陷入得救与否的不确定性甚至是绝望之中。更重要的是, 上述的诠释与路德的原典并不吻合, 根本不是路德所云“因信称义”的真正意思。

自从 197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 主张基督徒的“称义”与“成圣”是同时而不是先后发生的, “称义”不仅有着宣称的和未来的意义, 而且有着效果性的意义, 一个被基督称义的人不仅是在信仰与未来之中是圣洁的, 而且在真实的效果中也是圣洁的, 只不过它不是人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帝借基督而赐下的, 因为“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 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就参与和分享了上帝的性情。这种对路德的诠释, 不仅可以排除行为无用论和口头相信派的异端错误, 而且可以正确地处理信心与行为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它符合路德的与《圣经》的本意。对于强调“成圣、成佛与成仙”的汉语语境来说, 芬兰学派对路德的新诠释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异同。

生活和工作于芬兰二十多年以来, 笔者在芬兰学派的学术界接受教育, 在芬兰信义宗的传统中生活与成长, 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和实践经历, 并且翻译了数部路德的著作和芬兰学派的神学成果, 自 2014 年夏季以来, 笔者开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大、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及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进行讲学, 并介绍笔者翻译而仍未出版的手稿。

2014 年 12 月, 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 以“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为主题, 汇聚了中国大陆、加拿大的近十多位学者与数位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本刊此期收录了该次论坛的主要论文以及与此主题相关的对话和论文, 特以“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专辑”而出版。

笔者现在主要从事马丁·路德及其研究的芬兰学派的探索, 翻译的《马丁·路德书信集》、《芬兰学派之父曼多马文集: 马丁·路德研究》、《与基督联合: 马丁·路德的芬兰新诠释》等数部著作将陆续出版。除去本期专辑之外, 2015 年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教授主编的《世界宗教文化研究》合作开辟“马丁·路德研究及其芬兰学派”专栏, 组织多篇学术论文发表。笔者与山东省基督教两会合作, 正在出版《马丁路德证道集: 根据教会年历的主日顺序排列》学术研究版和实用版。与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合作也正在进行。今年夏天将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暑期班讲授路德神学及其研究的芬兰学派。此外, 正在与香港信义宗神学院的罗永光教授联合筹备 2017 年“世界路德研究大会”为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而举行的年会中的汉语分论坛。通过诸如此类的努力, 笔者期望汉语学界能够对马丁·路德、芬兰学派及其与汉语语境的互动予以关注并从中受到启发。

本期“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收录了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东芬兰大学系统神学教授拉乌尼奥 (Antti Raunio) 的“Knowing God and acting for one's neighbor. Contemplative and active life in Luther's theology”一文, 通过研究认识上帝和为邻舍而行动来探讨了路德神学中修士的沉思与积极的生活。而中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陆鹏教授的“原始宗教中的信”一文, 为我们探讨路德神学中的核心概念“信”提供了历史背景的梳理。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加拿大恩道神学院院长杨庆球教授的“王阳明与路德的属灵/成圣操练对现代人的启迪”一文, 杨教授是汉语世界少有的路德神学和王阳明研究专家, 该文不仅进行了理论比较, 而且对于实践性的操练也有许多启迪意义。本栏目还收录了燕京神学院副教授陈驯博士的“路德论政教关系”一文。陈博士学成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与笔者有同门之谊, 他对

路德关于政教关系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国内神学界重视加尔文忽略路德的状况,而且对中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实际问题也有重要意义。

“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收录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南京大学双聘教授侯建新的“试论原罪说和因信称义说的现代价值”一文,该文从《圣经》文本出发,结合历史学的纬度,探讨了原罪说和因信称义的现代价值,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语境都有参考意义。本栏目的第二篇论文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卉的《话语为刀剑、媒介为土地的国度》,她用圣经神学的方法对新旧约圣经中有关“话语”的信息做了一番梳理,并在此描述与诠释的基础上再次考察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起源及其边界,对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及基督徒世界话语权柄的来源与归属进行了辨析。

“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亚平教授的“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社会基础”一文,作者是汉语学界的德国史研究者,本文从历史的纬度分析了路德“因信称义”的社会基础。第二篇论文是北京大学徐凤林教授的“东正教的‘成神’与中国哲学的‘成圣’”,作者是国内少有的东正教与俄罗斯哲学的专家,该文将东正教的“成神”这个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成圣”进行比较,其中涉及的不仅是基督教三大宗派(罗马天主、东正教和新教)的核心概念,而且“成神”更是芬兰信义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对话的主题,并且在此基础上促使了马丁·路德研究之芬兰学派的诞生,徐教授的这篇比较论文,其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中西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故将此论文放入了这个栏目。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本刊主编与山东大学佛学专家陈坚教授关于芬兰学派与中国佛教的对话、以及本刊主编与道教专家、宗教文化出版社编审霍克功博士关于中国道教视野中的芬兰学派的对话。这两篇对话是专门为本刊预备的,根据录音整理和修订而成,对于促进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有实践性的意义。

“书评与通讯”部分收录了三篇文章,一是本刊主编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教授关于“芬兰学派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二是香港中文大学冯梓莲博士候选人评论《芬兰学派之父曼多马教授文集》的论文,“The Genuine Lu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from Mannermaa's Perspective—A Review 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nnermaa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 A Study on Martin Luther”。三是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候选人高源所撰写的“Introduction to the Fourth Nordic Forum of Sino-Western Studies”(第四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的会议评述),作者在赫尔辛基大学以奥古斯丁的情感为研究对象从事博士研究,与芬兰学派的多位学者都常有交流,在其评述中,他不仅报告了本次论坛的情况,而且结合奥古斯丁和东正教传统,从自己的视角诠释了芬兰学派。

我们原来计划收录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刘新利的“中国语境下的德国宗教改革研究”,但因为其他原因,该文于其他刊物发表,故没有收入本刊。刘教授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研究专家,留学于德国,是本次论坛的中国区负责人,她对路德的研究状况的探索与分析,为芬兰学派进入汉语语境提供了定位的作用。

2015年6月30日于赫尔辛基

English Tit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nnish School of Martin Luther's Research and the Chinese Context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19, Xijiekouwai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5, P. R. China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Email: paulos. z. huang @ gmail. com

Tel: + 358-50-380-3445